

# 王昕朋长篇小说《漂二代》

## 他们需要怎样的身份认同

☐汪 政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是一部不太好归类作品，可以说它是底层文学、问题小说、反腐小说，也可以是一部成长小说、新城市文学和文化小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容纳了太多的社会现实内容与深广的历史、文化思考。这部作品再一次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同时也再次表明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家，在现实矛盾突出时期应该具有的文学与思想担当。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它以一次偶然的治安案件作为叙述的起点。农民汪子肖祥、张杰与房地产开发商汪光军的儿子汪天大在小酒馆发生冲突，本来已经和解，但汪光军觉得丢了面子，找人为汪天大重新作一个假震荡的医学鉴定，找肖祥给抓了。这一“假病历”事件在农民工聚集地十八里香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种种社会矛盾因之更加突出，由此牵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各种人物也纷纷登场。靠不住手段家起的汪光军当然不肯轻易认输，因为这样一来不仅输掉了自己的面子，更输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在商界的利益；副区区长冯援朝也不能输，他的利益是与汪光军连在一起的，他们俱荣俱损；而十八里香的河南农民们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则经历了一番变化，他们既存在整体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境遇，也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不断超越自我，为了公平和正义，为了他们曾经的苦难和屈辱，也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生存，他们不再妥协，同时，他们也不断地从情感走向理智，从懵懂走向自觉，从被动走向法治。

小说中的《十八里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群落。我说《漂二香》是一部新城市文学和文化小说也就是从作家对这一文化群落的生态描写来判断的。十八里香原是北京郊区农村，随着城市的扩建，它现在已经是北京市的一部分。由于原来处在城市的边缘，所以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而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大都缘于同乡的关系，比如十八里香基本上就是河南人，所以，这样的地方是亦城亦乡的，是城市中的乡村，是文化的飞地。王昕朋对十八里香的描写实际上涉及到了城市文化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古典的城市是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一些乡村因为政治、文化、军事和宗教的原因而变成城市。而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建设则更为多样化，它们可以创造，可以扩张。相对于古典城市，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许一时间难以消化的新问题。

比如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需要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是原先的城市一时间无法生产出的,所以就要到农村进行各种方式、各种规模的“移民”。这自然会改变城市原先的人口结构与城市单一的文化性格。十八里香的人一方面是自己的老乡,一方面仍旧是自己的老乡,他们说着方言,按自己家乡的习俗生活,延续着自己故乡的风俗与价值观念。韩士政千方百计洗刷自己身上的乡土痕迹,刻意与十八里香保持距离,但他赖以谋生的还是农民式的智慧与乡土民间文化。李跃进的到来也是建立在乡土人观念上的。虽然到二代、三代,宋肖彬、张杰、肖祥等已经是“漂二代”,但在他们的身上依然保持着浓重的“进城”前的文化色彩。这些正是现代城市的特征。急速的城市发展、大规模外来人口的进入与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城市呈现出“杂色”,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汇和融合,使城市拥有了新鲜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在现代城市,固守传统的城市风格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它只会阻碍城市的发展。其实,与乡村相比,城市一直表现出开放与变动不居,它的生长速度与面貌变化要比乡村快得多,只不过这种功能与特性在现代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漂二代》对现代北京的描写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文化与城市理念,它着重书写的北京的“变”,是新北京人给这座老城市带来的多样化的新元素,这是现代城市开放、包容的方向——一座城市,只有敞开大门,保持流动,才会有发展的动力。

文化冲突与身份尴尬是《漂二代》的重要主题。十八里香的人们一方自在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又非常希望进入北京文化。他们对这个城市抱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她是他们的希望与明天，又是给他们带来伤痛与歧视的地方。特别是身份认同是他们进入城市最大的障碍，也是他们融入城市与城市零距离生活必须要穿越的隔离带。不可否认，城市在这方面还没有作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包括制度设计，甚至可以说，城市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自己的自私与双重标准。当城市需要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人口与消费人口时，城市鼓励外来人口，但是外来人口要求享有同城待遇时，却遭遇到城市的拒绝，这可能是当代中国社会较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漂二代》中的人物都是在北京出生，或

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北京，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在北京打工，但是他们的身份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作品取名“漂二代”，一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北漂”、“南漂”，指的是离开故乡到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则是指这些人的身份状态，包括他们的一辈，虽是农村户口，但人却不在农村，离土不离乡，同时他们身在城市，却不是城市人，在城不属于城。索尔·贝娄曾把他笔下身份缺位的主人公称为“挂起来的人”，王昕朋将中国进城的农民称为“漂着的人”，他们既不在农村，又不属于城市，始终在两极漂移。作品中主人公于宋肖这样表达对自己的身份感受：“老家对于宋肖新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在北京这么多年，她是外地人；到了老家，她感觉自己也成了外地人。”身份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属地称谓，在中国，它同时是一个人的文化标签。身份认同的同时就是文化认同，包含着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因为这些因素的差别与不平等，最终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平等，因而，身份歧视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当肖因“假工伤”事件被抓后在十八里香引起了骚动，作品对当时的群情激愤有一段描写，可以看作是这种歧视的描写：本来是出主意想办法的“请葛会”，却演变成控诉不公正待遇苦会。张三说，咱来北京快20年了，黑发变成了白发，却怎么也直不起腰。北京人养的狗走大街上都神气得很，感觉自己活得还不如那条狗。李四接腔说，可不是咋的，有钱人家的狗都能在北京上户口，有的为省钱还跑到乡下给俺上农村户口，这不是腌臢咱农村人嘛！王二说，俺上公交车售票员防贼一样，生怕俺逃票。到超市买东西，售货员一听俺这口音，俩眼珠黏在俺腕上，怕俺藏着掖着偷东西。真他妈的窝囊！年龄最大的赵五说，你们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没有北京户口的叫盲流，一有重要的节日就把咱当牲一样往外挤，到了火车站还得把大箱子行李李翻个底朝天。活急了吧不让走，工地四周都是翻个底朝天，像看劳改犯似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单单是这样的感受与偶然的遭遇，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政治、经济、教育与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限制。王昕朋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制约性因素做了深入的思考，说穿了，就是户籍制度。本来，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应该是一种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

管理方式,但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却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当然,如何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依然在讨论,《漂二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并没有提供户籍制度改革路线图义务,但确实集中而深刻地描写了落后的制度对他人的伤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漫长的制度争论与外来人口付出的巨大成本。到了肖祥这一代,没有户口教育就成了问题,“有的回老家勉强读完高中,又回北京来找父母,就业解决不了就做‘啃老族’,有的离开父母像脱了缰的野马,混迹社会,犯了罪进了监狱。实在不愿回去的,就逃到北京读民办的中专中技,更多的加入了父辈的打工行列……”在作品中,拥有北京户口、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人是来京务工者两代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可以付出“一切”。这“一切”包括生命、理想、奋斗,也包括牺牲、交易、堕落。当一个城市无视这一群体的身份诉求时,它必然要为之付出沉重社会管理成本。《漂二代》看上去的冲突是围绕“假伤门”事件的,但内存的矛盾却却是缘于十八里人的身份焦虑,是一种被伤害、被歧视、被抛弃的社会心理的宣泄。

虽然如此，《漂二代》并没有停留在平面的批判与谴责上，应该说，汪光军这样的不法商人和冯援朝这样的贪官刻画得很成功的，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宋肖新、肖祥等“漂二代”。王昕朋也描写了他们身上的复杂性，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平时的愤慨、悲伤和失望，但最终，他们站住了。作家显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或者不如说，王昕朋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城市的新人。肖祥虽然因“假防干”事件被抓了，但他相信法律的公正，乐观地对待命运。特别是宋肖新，作者带着理想、同情、赞美与祝福来描写他的，她虽然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但却因此激励出了坚强、自尊、同情与聪慧。强权的欺压、名利的诱惑、亲人的误会都没有击倒她，虽然，面对几乎没有希望的抗争，她也有过犹豫，她知道，“现实环境最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存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个人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另外一个个人轻而易举拿走时，往往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鲜血淋淋；一种是投降，求得生路，以图东山再起。现实生活中选择走第二条路的是多数人。”她也过这样的自我暗示，“也许人就应当活得现实一些。既然你改变不了现实，就得去适应现实。其实，这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往往只是一念之差”，但她最终的依然是不妥协的道路。不仅是宋肖新，还有张杰、张刚、冯功铭等，作品都写出了他们的变化。“漂二代”是成长的一代，是城市新主人，是城市的希望所在。我不否认这样的描写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面对现实矛盾，仅有愤慨是不够的，还应该让我们看到理想，看到那些努力改变现实的人们，并且受到感染和鼓舞。

这是塑造新人的作用,也是现实主义的力量体现。

## ■ 创作谈

有人问我,你在国家机关工作,怎么会熟悉《漂二代》中这些人物和故事?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感情。我们常说，文学来自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在我看来，它更是作家感情的反映和体现。

4年前一个周末的傍晚,朋友带北京某大学一位女生来找我。那位女生边诉说,谈她男朋、友另一所名牌大学学生在城郊结合部一饭店吃饭时,因为一件小事与当地一男子发生争执。当地男子听她男朋、友外地口音,一句“一个外来的野种”,边骂边动手。她男朋、友个子弱小,那个本地男子高大魁伟占着上风,而且刚刚动手就被人拉开,相互之间没有造成伤害。但两周后,她男朋、友却因伤害被刑拘……这个情况与《漂二代》中“假打工”的情节几乎相近。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让我感到痛苦与不安。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定入深入生活时,我报名到北京某区深入生活,到农民工聚集地区深入生活,用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漂二代》这部长篇,是我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和思考的文本呈现。对“漂二代”的聚焦,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这一群体贴标签,而是要提示身处于此一社会境况之下,他们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应忽略的;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所着意侧重的还是他们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想写出他们身上的温情与爱意、仇恨与苦痛、困惑与迷惘。

在我看来,现实感在小说写作中是不可少的元素,所谓现实感表达的并不单是对传统写实主义的倚重,以编年史、地方志和人物志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做出镜像般的映照和摹写。我所理解的“现实感”,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对生活实感和命运遭际的书写,又不至于对内心世界和精神体验的叙述。须知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是关注外部世界现实状况的书写倾向,实际上,感情的介入往往同时掺杂其间,也惟其如是,才能避免对小说写作的简单化处理,才能还原事物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对类型生活的特定关注是我持续不断甚或有时是逐渐升温的写作尝试,尤其对底层人群的生活样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与关注。各种生存状态中的平民意识,以及在这平民感情息息相关。如此这般的感触和思考以名状的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在《漂二代》的写作过程中,我竭力保持一种倾注自己的感情、通过背负着沉重的身份——“异乡人”与形态各异的“北京人”之间的交情情节的发展:宋肖新与律师男友冯功权的交往娶了并不适合自己的北京女人,张杰与富二代李隆生与汪光军和冯援朝的苟且,汪光军和谋略构、区委书记的慰问与李京生的执拗等种种和平民意识时,我努力保持理性审视的眼光和普遍的情感,上升到心理层面的映射,甚至

再说“漂二代”，面对一代代人矢志不渝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作出反思：以“漂二代”是否对“北京户口”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超群升迁，意不在否认他们追求人生的努力，需要提醒而迫切的追逐过程中，很多人失去了本不该快乐和健康的人生，说到底，我们的教育，乃至一种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仿佛一切都以高量标准。在这样的风气和氛围中，泯灭了尊严，失落了天理，更消隐了情怀。”可是，她（指开老屋的门锁，就是想，她也没有本没有钥匙，需要钥匙。”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隐喻，家宅难归而，都市欲望与生存危机却如梦魇般挥之不去，与都市的漂泊感充斥着“漂二代”的无依感所表达的漂泊感充溢着“漂二代”的反抗那样的暴发，用足够的金钱将女儿韩可族学校，依然免不了其被视为“土妞、下里巴人层/政治规约下的经济/生活共同体的“漂二代”已经不仅只是制度和社會問題，更是引发了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危机。因而我认为，所谓认识，其本身也是立体而丰富的，不能简单地说，其倾向性。所以在《漂二代》的写作中，我本身的所面对到的期许与反思、渴望与审视

围绕着“漂二代”的代表人物肖祥的陪衬，说着墨最多的部分，而在北漂者与僵化体制的竞争中，人性的善与恶、真与伪、仇与快、爱与恨，在小说中试图追索的叙事效果。然而，我更从某种意义而言，很多人在在对肖祥以援手的“营救”自己——通过不断地回顾确认个人认知的角度出发，以满腔之热血，在逼反的现场和人生之草莽，以此消解内心之愤懑、郁闷。其说这是迫于无奈的反抗压迫之举，毋宁说和姿态，完成对自我的一种救赎。因而我所及我所持有的平民立场，与其说是在聚拢大主题并最终施以解决，不如理解为我对自身情在生存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感情的情緒摆脱、价值回归和精神牵引。这种根本与自我的相悖，也成为我小说叙事的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

# 感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

□王昕朋

## ■新作快评

肖克凡《喜荣归》，《十月》2011年第6期

## 一次冒险却成功的尝试

□周其伦

天津作家肖克凡的中篇小说《喜荣》一部有别于以往谍战文学的“个性”作品中塑造的崭新艺术人物形象和精心的构思人眼前一亮的。

《喜老归》所展现的场景,作为谍战剧,不算新鲜,依靠来还多少有一些老套是,作者却能够依老创作出力另辟蹊径们架构了一部看似老套、实则充满新意戏,显现出作者足够的生活阅历和开阔的撑。可以说,肖克凡以相当厚实的地底,不仅没有踏入同类题材的白槽,而且献出许多新意,让一个貌似熟悉的故事该别有洞天。

首先,《喜荣归》在故事情节的设置和形象塑造上,都添上了别具特色的“首意”。主要人物俞明喜,从抗战时期的进步,成长为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天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为祖国和民族做了一工作;隐藏极深的日本老牌特务吴却一直是他的私交甚笃的密友。这为两间的较量埋下了伏笔。作品开始于激愤爱国忧民的翟校长被暗杀这一令人震惊突发事件,并从此牢牢牵引着读者的视线,理性极强。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展开,作细腻地表现出天津地下党特工、国民党日本间谍之间的殊死较量。而为地下党的俞明喜,却因为地下斗争的需要,一持着普通身份,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天津地下党老燕等几个人知道。而在故事结尾俞明喜和吴荣成这对“密友”,竟殊路相逢东抗日根据地时,面对严酷无比的分别,俞明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也为了隐藏在根据地的日本特务,不惜与吴荣归于尽。俞明喜临终前的瞬间,眼睛里对光明的期待和对妻子的柔情。这个画面使读者久久地震撼不已。相信读者读到这里定感佩万端。

曾几何时,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有着  
万个像明喜这样的人默默地为它奉  
有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他  
的很多人却限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至今  
有获得昭告世人的名分。这对先烈们来  
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肖克凡塑造  
明喜这个艺术人物形象,让我们不安的心  
些许安妥,在文学创作上也算是填补了一  
白。

《喜荣归》还有一个有别于其他谍战作品

的艺术特点,它没有在我们习惯不惊的情报、情节、传递、交接上过多地纠结和着墨,也没有任意渲染某个情报或者某个事件有多么重要,而是始终把故事的重心放在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梳理和个性刻画上。作品中诸多人物的设置以及他们身份的揭秘,初看似乎有些突兀,但是当你能读完作品以后细细琢磨,倒觉得正是故事在你的铺垫中已然瓜熟蒂落,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国民虎特务丁恩正身份不会使人惊异的话,那他的女儿、从小就娇生惯养的丁小夏以一个地下交通员的身份猛地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被惊得目瞪口呆呢?然而只要你能认真读完作品,你就会发现作者已经在前期阶段进行了铺垫,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揭秘”了。

《喜荣归》的细节刻画也特别到位，最有表现性的是对吴荣成睡梦中熟读流畅的日本小说语和他在吃饭时对厨师的一往情深描写显得非常清晰自然，在我们过去的作品中不见的。正因为作者在创作《喜荣归》时把作品的笔墨倾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以作品能够把敌我双方的各色人等都写得有血有肉丰满可感，有很强烈的艺术张力。这部小说名字还巧妙地搬用了同名戏剧的名字，既出于作者为了谋篇布局营造故事氛围的需要，也蕴含了俞明喜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渴望有一天荣归到党的怀抱的深刻寓意。作品在最后描绘俞明喜回到冀东根据地，却因形势所迫在自己同志面前备受责难、委屈到完全的情态，更是反衬了俞明喜“喜荣归”的渴望。生活在常态下的人也许对这样的情感不是特别理解，但作为一个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此时内心起伏的波澜，却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并表现得颇具笔力，扩大作品的审美空间。

一部好的作品，成功的情节构思，感人的物人形象缺一不可，《喜荣归》这两点做得比较好。在《喜荣归》发表前，类似的谍战小说我们已读过很多，有的作品也相当有灵气，且具有市场号召力。肖克凡能够在这个时候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确实很需要勇气。作品的成功尝试也证明作者手里的确有“活儿”，读肖克凡的新作，我也联想到《潜伏》的原作者龙一。天津这个城市，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都算不上谍战故事的富矿，但天津的作家们却创作了层出不穷的谍战故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 ■短评

## 羊的样子令我心痛

康启昌

满特嘎一眼，她一定感到嫁到这棵树是十分幸福的。而原来挤在满特嘎身上的快乐也消失了，他享受着没有思想的快乐。像一头老牛，卧在晚风的草地上，望着远处的牛群一动不动。”把满特嘎比作一头老牛，描述老牛悠然的样子，活脱脱地画出满特嘎进入禅境的神态。

“交织一起变成所谓地籁——浑然的声音，大提琴奏在低音声部的运弓，一直往右拉，不回弓。曼托瓦尼乐队就是这么处理尾音的——录音时，把起弓声贴在回弓上。就如同乐队的合力运一把弓，边运边拉，从斯图加特走到瑞士琉森，像一队贩私盐的人们。”先把声波比作大提琴运弓，进一步比作曼托瓦尼乐队的演奏，又进一步把演奏比作盐贩子在行走，层层比喻，深度描绘，真是妙极了！但是我要打住了，因为这种借用比喻和拟人格的修辞使画面生动活泼的绝技，不胜枚举。

三是地域性，即作家的个性。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打上地域的印记。鲍尔吉·原野，籍贯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鲍尔吉，乃蒙古族诸部落中黄金家族的姓氏。他在娘肚子里就继承了蒙古族高贵的血统。他的散文的艺术风格正如草原上的阳光、空气、月亮、露珠，清新、亮丽、沉静，从容。他不过分经营张力，不做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语调也不急副尖拔，不咄咄逼人。

童年，他在赤峰市昭乌达盟公署家属院度过。红砖平房、短垣小院、地黄沟，有汉族人家定居草原的宁静，没有游牧人家的蒙古包、牛栏、羊群。父亲是翻译家，他自幼便接受蒙汉双语教育，这种生存环境，自然产生了民族融合的人文背景。在他恪守民族特征，接受文学全球化挑战时，必然会有蒙汉文化交汇的优势。他用童年时代

民族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在表现现代世界时,他有更加复杂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描绘。《我妈妈的娘家亲戚》《文革旧邻》《乡下女人》《小羊羔》等都是地域性很强、弥漫着浓浓的草原芳香的佳作,读者可细心品咂。原野散文的